

《周易》的风险管理思想

吴之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统计与金融系，合肥 230026

摘要：《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本文分析了易道的思维模式、价值理想和实用性操作，并重点讨论了《周易》的变易思想，笔者认为《周易》整体上可被看作风险管理著作。《周易》认为，推动变化的原因在于阴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引起风险的根本原因。《周易》赋予了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格，正是这种人格使得《周易》具有了与西方不同的风险管理思想，它是主客合一，既强调对客观风险的认识，也强调风险管理者的自身的主观人格因素。

关键词：周易 风险管理

一、《周易》及其易道

《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之际，它是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组成的符号系统，以及由卦辞和爻辞组成文字表意系统。《易经》用确定的卦名和爻名，在巫术发展史上起到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承先启后作用。《易经》的文字表意系统不但充分反映了殷周之际人们的精神风貌，记录了当时人民所掌握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政治伦理知识以及哲理性的生活知识，而且接受了当时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与卜筮相结合，构成了一个以天人之学为理论基础的巫术操作体系，为后来的人文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通路。

《易传》是对《易经》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大约于战国末年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就其思想内容的基本性质而言，诚然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与《易经》本文的那种卜筮巫术大异其趣，但是，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它又不能不把用于卜筮的卦爻符号与卦爻辞奉为神圣，力图从象数与义理方面来阐发其中的意蕴，这就使得它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形成了一种哲学思想与卜筮巫术的奇妙结合。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并把易学研究的派别分为象数和义理派。象数派侧重于从符号系统，就巫术文化理解。义理派侧重于从文字表意系统，就哲学思想理解。笔者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研究员的见解，把《周易》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易道是它的思想精髓，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周易》的易道既包括思维模式，也包括价值理想，还包括实用性的操作。

易道的思维模式是一种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这种思维把世界的统一性看作是一个自明之理，着重于探索天与人、主与客、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其中的规律，用来指导人事。

易道的价值理想是追求一种以“太和”为最高目标的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易道的实用性操作层面是直接继承了原始的卜筮巫术转化而来，从忧患意识出发，立足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力图趋吉避凶，转祸为福，使客观形势朝着有利于人类目的的方向转化。

二、易一名而含三义

“易一名而含三义”，自《易纬·乾凿度》以来，各家称引略有不同，而其解释也各说纷纭。《易纬·乾凿度》认为：“易者易也，简易也，不易也。”自郑玄开始，一般认为“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笔者在此不详细解释古人关于易的三个含义，而采用南怀瑾先生关于变易、简易、不易的解释。南先生认为，宇宙万物都处于变易的过程中，包含着不可变易的规律，变易中有不易，人一旦掌握了这种规律，复杂现象的规律就变得简易了。笔者正是看到南先生的这个解释，开始思考《周易》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简单地说，保险就是对风险提供保障。保险公司的精算师首先需要评估风险。风险本身是不确定的，但一旦找到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的规律，风险的规律又是简易的，而且这种规律性也体现了风险蕴含的不易性质。因此，笔者当时直观地认为，《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风险管理。

三、风险、变易与风险管理

风险是针对个人、集体或人类社会而言的、有可能在未来带来有害后果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中，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风险，我们也就不会遇到风险。不确定性就是《周易》中的变易。

风险现象是一种“时间”现象，风险概念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时间有现在，有过去和未来。从决策的角度看，过去的世界对于我们是一个“没有风险”的世界，而“未来的世界”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风险现象是一种属于未来世界的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从现在延续到未来的现象。

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的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他还认为，讲宇宙最详密者是《易传》。《易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迁，整个宇宙是一个变化的大历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传》更认为惟有变化，然后宇宙可以不穷而久，“《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传》又认为变化是创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宇宙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此即所谓易，易是宇宙中的一根本事实。“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以天道作为人事活动的出发点，从自然秩序中寻绎出社会秩序，通过对宇宙生成图式的架构，《周易》寄托了那个时代的先哲们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理想与期望。这就是前面阐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想。基于宇宙是一个大化流程的认识，统贯天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和“太和”的价值理想基本上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内涵。很自然地，易道的实用性操作就是通过对变易的认识，力图趋吉避凶。

殷周之际，社会生产水平和科学知识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对于外界自然界的水旱灾害和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等既不理解，也无力抵抗，感觉人的生存完全由神灵支配，于是卜筮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以使人的活动与天意相符合。这时人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能否生存？《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礼乐文化的崩溃，社会逐渐走向激烈冲突的时代，人生多变，祸福难测。这时候如何生存的问题成为人们思考的中心。从自然推人道，将“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统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阐发生存之道，以求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夫

《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天命神学逐渐过渡到人文的理性。

《易传》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卦与爻的直接意义是断定吉凶。“吉凶”是简略语，说完全了，应是“吉凶悔吝无咎”。“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人们的行为有得有失，得为吉，失为凶。由于行为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吉凶也在不断地转化。”“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就是得失不能两定，在两可之间，结果是要看主观努力如何了。”无咎者，善补过也。”《周易》是寡过之书，是知道人们处于一定条件下，如何争取最好的结果，即风险管理。

《易传》云：“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于此哉！”“彰往而察来”，由过去预测未来，这与西方传统的风险管理观念是一致的，但中国先哲在风险管理中使用的时间观念比这更高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祥龙教授把《周易》中的时间观总结为“原发时间观”。所谓“原发时间（original 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成或发生。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的当场呈现。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可见，《周易》的变通不仅仅是数理上的组合变化，而是在此卦爻的变化态势之中开启并领会到的“时机”或“天时”。“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原发时间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时”是《周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历代易学家都十分重视“时”的研究。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也。”程颐说：“看《易》且要知时。”六十四卦的卦爻结构在《易经》中已经定型，但“时”的概念是《易传》把卦爻结构改造为表现阴阳哲学的工具而后形成的。照《易传》看来，卦以六爻为成，爻分奇偶，位有阴阳，由初爻以至上爻，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阴、阳两大势力的不同配置情况。一卦代表一个时代，一爻便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阶段。关于六十四卦之“时”，历代易学家作了各种各样的分类。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豫卦》中从冲突与和谐相互转化的角度将之分为四类，他说：“然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也；四者改易之时，变革之世也。”

卦有卦象，爻有爻象。《周易》的思想通过象来表达。但是，象只是我们认识《周易》思想的手段，不可钻到象里不出来，要“得意忘象”才行。只有在理性分析卦爻结构的基础上才可以预测事物的发展前途。这种预测当然是“得意忘象”，只有对我们的思维进行大量的训练，抽象出以卦爻结构所表示事件的普遍意义，才能结合实际，“彰往而察来”，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四、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传》认为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引起风险的根本原因。凡对立者皆有统一，凡事物都包含对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是《周易》时代的辩证法。

阴阳是《周易》中最重要的对立概念，其它还包括刚柔、盈虚、往来、寒暑、内外、长消、贵贱、上下、尊卑、进退、天地、乾坤、动静、男女、夫妇、君民、君子小人、吉凶、昼夜、水火、始终、死生、安危、治乱、存亡、得丧、奇偶、几著、离合、易险、屈伸、常变、恒革、盈谦、泰否、剥复、既济未济等等。《易经》是用阳爻和阴爻两个符号表示对立思维，而《易传》则是用阴阳概念明确指出了”阴阳”的对立性质是宇宙所普遍具有的法则，也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这里列出的其它对立概念无非是阴阳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周易》的阴阳辩证观首先体现在卦与卦之间的整体结构之中。《易传》说：“《泰》（卦名）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如此等等，每两卦为一组，都是相反的。每两卦之间的关系是”物不可以终……，故受之以……”，即相互之间的渗透。这是基于物极则反的认识，也就是《易传》中的”无往不复”，具体应用可见：“危者，安其位者也。王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即是说，安于其位，结果招来倾危；维持现状，结果招来灭亡；自恃其国家易经得到治理。结果招来祸乱。因此，要随时保持忧患意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身安国保的目的。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在政治生活中防止走向反面。这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转化。

《周易》里还表现了对立面相交而生生不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就是世界万物尚未形成前的原始浑一状态，然后有天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传》特别注重”生”，以生为天地之根本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

天地交感以求阴阳和谐是《周易》的最高价值理想，这就是”太和”。《易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天道是刚健中正的。由于乾道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保持了最高的和谐，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程颐解释说：“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

《易传》作者清醒地看到，这种太和境界只是有待追求的目标，并非既成事实。由于阴阳两大势力除了统一的一面，还存在斗争的一面，在二者推移的过程中，常常出现否塞不通、阳刚过头、阴柔太甚等等复杂情况，甚至彼此伤害，不可调和，迫使安定转化为动乱，和谐转化为冲突。忧患意识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大致说来，《易传》通过对现实处境的分析，把动乱冲突分为四种类型。如否卦，阳刚势力高踞尊位而不与阴柔配合交往所造成的否结不通；如大过卦，阳刚发展过头而造成危机；如困卦，阴柔过甚而破坏了社会整体生活中的阴阳平衡；如革卦，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激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如何处理上述阴阳失调的状况？在失调前，《易传》并不是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把握度，尽量避免向坏的方面发展。《周易》尚中，“中行，无咎”，以”中”为度。在发生失调后，则采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方法，但变中有常，否则很难化危为安。

五、变中有常

《周易》讲变，也讲常。《易传》说：“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一切事物虽都是变动不居的，生生不已，然而变中有常。变所以有常者，因为变动是不可乱的，“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之动虽繁，而正于一，因此天下又是至简的。不管是变易，还是简易与不易都可归结为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

何为道？《易传》说：“昔者圣人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传》通过阴阳概念发展而为统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整体之学。

《易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这里明显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大人”指道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他的道德与天地相配，效法日月普照万物；遵循自然法则按时令顺序行事；前途或凶或吉，虽不经卜筮亦与鬼神之意相合。

《易传》在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时指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为万物之本，即众德之首；体仁即实现仁之德，然后足以为人民之长。亨言众美之聚；众美具备，文彩可观，故足以合礼。义之和言一切当然的和谐；如能达到义之和，则一切人的生活各得其适，而无不利，是利的极致，故能使人物各得其利，然后义无不和，利物足以和义。贞即正，即真；德正而坚定不移，然后足以成功。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法天，刚健中正，故能有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刚毅宏正的人格；君子法地，谦逊宽和，故能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人格。具备这样人格的君子，即使在卦象非常凶险的情况下，也可以转危为安，变不利为有利。刚健中正、谦逊宽和实是达“太和”价值理想的必备人格。”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就是最好的注解。

《周易》尚“中”，易学家也多持“时中”、“中正”的说法，“知时研几”应以“中”为本，“正”也是为了“中”。《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只有具备德正的人格才能“守中”，尽量避免事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在风险管理思想上是一个独特的视角与贡献。西方的风险管理思想是主客二分，主要强调对风险管理对象的认识，从客观风险的物质因素、道德因素和心理因素去把握。《周易》中的风险管理思想则是主客合一，既强调对客观风险的认识，又强调风险管理者的自身的主观人格因素。西方的主客二分方法忽略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管理者自身的“身不正”，不但自身可能成为一个风险源，而且看问题已经有偏颇，何以“知时研几”，更何谈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的能力。因此，《大学》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六、结束语

《周易》二千多年以来一直被列为“六经”或“十三经”之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张岱年认为：“《周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我们必须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其精神。”《周易》的阴阳对立统一、天人合一、太和、刚健中正等概念或思想都可以在其它古代经典文献中发现类似的叙述，这是《周易》中“活”的文化基

因，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周易》中也有“死”的因素，本文没有进行讨论。当然，我们也不必用现在的眼光苛求两千多年前的《周易》。

《周易》中的风险管理思想表明，中国传统哲学中有一个和西方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原则，即对人类自身现状与未来命运的体认，从人类生存发展和安身立命出发达成对人的根本关怀。这是“智慧之爱”，而不是西方传统的“智慧之学”。“智慧之学”研究整个世界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笔者认为伦理道德既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也是作为风险管理者的必备人格，中国文化正是透过《周易》为代表的经典，培养了中国人独特的风险管理思维，达成对人的根本关怀，从根源上解决如何生存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文化毋宁说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不如说是一种风险管理文化。

从严格意义和根本意义上说，风险现象只能是而且必定是社会现象。因此，任何风险都必定是而且只能是针对某个人类主体而言的风险。讨论风险问题时所针对的主体一般说是作为个人的主体或作为集体的主体，有时也可以是某些类型的主体，甚至是全人类和人类社会。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体现了对人的根本关怀。西方现代哲学也有人文关怀的转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共同交汇点，或许这也是构建风险管理思想体系的共同交汇点。

参考文献：

- 1、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 2、余敦康著，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3、金景芳讲述，吕绍纲整理，周易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4、南怀瑾著，易经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 5、南怀瑾著，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 6、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7、张岱年主编，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8、李伯聪，风险三议，自然辩证法通讯，第二十二卷总129期，2000年第5期；
- 9、李笑野马艳，《周易》的风险观及其现代价值，财经研究，第30卷第2期，
2004年2月；
- 10、汤一介，张岱年先生和《周易》，周易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六十五期）；
- 11、韩秋红刑立军章文斐，谈中西哲学融通的哲学观，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 12、吾敬东，古代中国思维对对立现象的关注与思考，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
- 13、张立文，《周易》的智慧，周易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五十一期）；
- 14、高岩峴，试析《周易》中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殷都学刊，1998年第4期；
- 15、李芝兰，易学的尚中思想，南开学报（哲社版），1994年3月；
- 16、魏文彬，浅谈《周易》“中正”与“和合”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
- 17、郑万耕，阴阳变易学说的思维特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

- 18、丁四新，“易一名而含三义”疏辨，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3期；
- 19、李廉，《周易》哲学在于按规律行止，殷都学刊，1994年第3期；
- 20、张祥龙，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2期。